

新形势、新机制和新欧洲

——第四届“海峡两岸欧盟研究论坛”综述

杨海峰

2014年11月3日至4日,由中国欧盟研究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等共同举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欧盟研究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海峡两岸欧洲研究学界共同关心的各领域问题,展开了交流探讨。

本届论坛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主持。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伍贻康、中国欧盟研究会会长戴炳然、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曹子衡和“台湾欧洲联盟中心”主任苏宏达分别致开幕词。闭幕式由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陈新主持,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徐明棋、丁纯教授及苏宏达教授分别致闭幕词。陈新教授还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和周弘学部委员向与会学者致以问候,祝贺论坛顺利举行。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新机制和新欧洲”为主题,围绕“债务危机与欧盟体制变革”、“欧盟内部关系的变化与挑战”、“欧盟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调整”、“欧盟经济面临的

挑战与结构转型”和“欧盟的安全、社会与文化政策调整”等专题,探讨在欧盟三大机构选举换届、整体经济增长乏力、周边局势变幻不定的环境下,欧洲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一 债务危机冲击与欧洲经济面临的挑战

伍贻康教授指出,欧债危机是综合性、结构性的危机,至今尚未完全结束,对其后遗症要有充分的估计。欧债危机暴露了欧盟体制的缺陷。德法作为欧洲一体化50多年来的核心或轴心,现在处于有史以来最松动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处于最不协调的一个阶段。但与此同时,欧债危机也有可能成为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陈新教授认为,从欧债的危机管理角度来说,欧盟现有的治理结构已经产生了效果,即把欧债危机引发的动荡形势稳定下来了。但是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怎样从危机管理的方式变成一种增长的方式。目前来看,欧盟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中长期的进程。

江时学教授指出,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前景悲观。欧元区内的第二、三大经济体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形势都不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欧元区在明年陷入通货紧缩的

可能性为 30%，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40%。

丁纯教授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公共债务的超标有关。欧洲公共债务短期内继续趋同的可能性较大，而其长期趋同则取决于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成员国结构性改革的成效。欧债危机发生后，由于欧洲采取了紧缩政策，财政赤字明显减少，总债务的上升速度也在减少，但是这种情况也带来了明显的机制性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以德国为首的“强势国家”希望各成员国能够遵守财政纪律，避免债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如果强制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就会造成相关“弱势国家”无法走出危机，产生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的通缩问题。

叶国俊教授认为，欧盟需要刺激经济，但无法做到像美国那样的量化宽松。因为量化宽松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发达的公债市场；第二，长期受国际信任的债券市场；第三，发达的公司债和证券市场。但是欧盟的问题在于金融市场规模不够大，同时成员国间对量化宽松的意见不一。

二 欧盟内部关系变化与政策调整

林子立博士认为，欧洲统一的基础在于和平共存与经济的双重建构。经济是欧洲各国合作深化的动力，对内促进欧盟内部团结与凝聚力，对外则借由整体经济实力有效转化成欧盟在国际的影响力。但自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对外经贸关系出现转折，内部出现了集体认同危机。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造成民众与成员国对欧盟产生质疑，进而危及欧盟运作基础。部分成员国对经济联邦主义产生质疑，甚至认为政治联邦

主义成为死胡同。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反映了民众对欧盟处理欧债危机的不满与宣泄：一方面是反欧与疑欧派崛起，成为欧洲统一的变数；另一方面是欧盟内部权力进一步向德国等国倾斜，危害到欧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发展。

朱贵昌教授提出，英国早在 2012 年就对欧盟权限开始了评估。一般认为英国国内对欧盟所谓的过度干预非常不满，但到目前为止从英国自己的评估结果来看，其认为欧盟的权限相对合理，符合欧盟条约的规定，并没有过多介入到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当中去，而且总体来讲留在欧盟对英国有利。

田德文教授提出，自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后，欧洲国家先后陷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长期奉行的以宽松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进而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做法不再可行。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先后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转而将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为“促进就业”的主要手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本质就是放松过多的劳动力市场规则，同时增加政府补贴用于劳动力培训等社会措施，增加用工量。如果将一定的失业率作为欧洲国家的常态，那么欧洲 30 多年来的改革在促进就业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较高就业和较高失业并存正在成为欧洲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特征。

成新轩教授从劳动就业、储蓄与消费、宏观经济增长三大方面，对 1990—2013 年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北欧社保制度的改革减少了公共赤字水平、避免了税收负担的加重、稳定了经济

发展。其中,劳动力市场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纽带,也就是说强化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以及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调整劳动力市场政策,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有效促进作用,同时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程度,从而实现一个国家效率和公平两者的均衡状态。

李阳博士认为,时至今日,欧盟已经搭建成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并且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第一,碳交易规模增长较快;第二,欧盟各成员国在碳减排控制和新能源技术开发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第三,由于碳交易品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欧盟的资本市场获得了扩充,并且整个金融业得到了深入发展;第四,欧盟碳交易体系和邻近国家的碳交易体系实现了成功对接,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碳交易网络。但是欧盟的碳交易平台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配额过于宽松使控制减排量和推动新能源技术发展的初衷无法很好实现,同时配额发放过程中权力滥用、腐败现象丛生;二是市场监管缺失,法律政策的制定跟不上市场的快速多元化发展。

三 欧盟对外关系变化与政策调整

陈志敏教授和吉磊博士提出,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全球和地区层次引发了多边主义双重危机,在此背景下,欧盟面对内外挑战,历史性地出台了第一个安全战略,明确把支持和推动基于“有效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设定为自身的战略目标,阐述了欧盟对于国际体系格局及制度安排的观念和偏好。然而随

着国际格局的持续变动,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并日益明显,“有效的多边主义”这一具有强烈规范性色彩的国际秩序观在欧盟内部受到了来自务实派和退守派的局部修正。退守派更加关注欧洲的实质利益,主张欧洲的政策重心要从全球退回到周边。务实派认识到世界力量正在发生转型,所以需要跟新兴力量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务实派与退守派之间的政策主张差别使得欧盟对外政策的实践更加复杂,并充满矛盾。

陈麒安博士从制衡概念出发,检视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及欧美关系。冷战后,欧盟及其内部的英法德等主要大国并没有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也就是没有大幅增加军事能力,所以欧洲并没有对美国进行内部制衡;同时欧盟大部分新成员国在加入欧盟前已经加入了北约,没有破坏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所以欧洲也没有对美国进行外部制衡。就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来说,即使存在欧盟提升自我行动能力的情况,其目标也不是美国,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区域冲突、处理周边安全事务,比如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郑春荣教授认为,2013年12月新上台的德国大联合政府表示出了积极参与塑造国际秩序,为解决国际与地区危机和冲突做出贡献的意愿。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给德国提供了一个推行积极有为外交政策的时机之窗,同时也对该政策究竟能否取得成功提出了严峻考验。德国虽然坚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整体安全解决方案,但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张优先考虑和俄罗斯进行对话战略,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对话没有取得成效,其欧洲战略随之调整。未来一段时期,德国或者整个欧盟将会与俄罗斯形成有限合作和有限冲突的格局。

洪美兰教授认为,欧盟东扩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乌克兰等传统东欧国家都转向与欧盟开展积极合作。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希望利用欧亚联盟应对欧盟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乌克兰危机使欧俄从冷战后的经贸竞争转为朝向经济战形态发展,新冷战俨然成型。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把克里米亚夺回的一个关键所在,是其兴建的“南溪线”将会经过黑海。乌克兰危机如何落幕将决定未来欧俄的竞合关系。

苏宏达教授认为,从亚洲国家视角看欧盟的亚洲政策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从日本、印度到印尼等国都在抱怨欧盟过于重视中国,中国在欧盟亚洲政策中所占比例几乎有 80% 之多,可以说欧盟的亚洲政策其实就是欧盟的中国政策。但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的亚洲政策又是比较失望的,觉得欧盟做得还不够或者还不够好;二是除了韩国以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对欧盟亚洲政策都是失望的,不过大部分亚洲国家和民众还是希望欧盟未来能在本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日本和印尼学者发现,欧盟如果将欧盟或亚洲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亚洲行动中去,则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四 中欧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冯仲平教授认为,欧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欧盟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经济低迷增长会

成为一个新常态。第二个变化是欧盟内部的传统政治力量的权威性、影响力都在下降。第三个变化是欧盟今天面临的安全环境是自冷战结束之后最为恶劣的。第四个变化是欧盟不论在扩大还是深化方面,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最后一个大的变化是欧盟的国际影响力在下降。与此同时,中欧关系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中欧经贸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结构性变化会不会带来未来 30 年中欧经济关系的稳步发展? 第二,美国、俄罗斯作为中欧关系中重要的外部因素,发挥了何种作用? 第三,当前欧盟奉行实用主义的对华政策,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还是一种长久变化?

闫瑾教授指出,中德关系在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中已经成为一组合作层次紧密、富有成效而且稳定成熟的双边关系。近年来,特别是 2014 年以来,中德关系又注入了很多新的发展动力:第一,从国际战略局势来看,中德两国都是当今国际舞台上实力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家,在战略上的相互倚重更加突出。从国际经贸角度来看,中德都是出口大国和强国,双方在共同推动建设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有着共同任务。就国内形势而言,未来几年是中德各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双方实现共同进步、增长的关键时期。第二,2014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时双方发表了中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10 月李克强总理访德时又发表了中德合作纲要,这些政策文件规划了未来 5 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德关系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此之前,中德双方已经建立了 60 多个政府间经常性对话合作机制。这些政策

文件和对话机制构成了中德合作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三,除了经贸领域,中德还在建立更加紧密的政治合作以及改革伙伴关系。但是,中德之间也面临着一些新挑战或新问题,即德国到底能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德创新伙伴关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以及德国在妥善解决中欧贸易争端、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和自贸区谈判方面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张永安教授提出,经贸是中欧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关系到双方的实际利益。就中国而言,欧盟是一个大市场,但问题在于这个出口目的地市场过于集中。其弊端在于:一是容易引发贸易摩擦;二是扩大市场遭遇困难;三是不利于同更广泛的欧盟成员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欧盟不断东扩使其成员之间的经济非同质化表现更加明显,相当一部分新成员缺少系统的工业化体系,这为中国将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打入中东欧市场,进

一步发展同欧盟的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杨逢珉教授指出,农产品贸易在中欧贸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自2008年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国农产品出口在欧盟市场整体呈现不稳定趋势。欧盟市场对农产品进口需求的变化以及中国农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影响中国农产品对欧出口额增长变化的主要因素。对于占中国农产品出口较大份额的德国、荷兰和英国市场,“增长效应”与“综合竞争力效应”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以欧盟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市场战略,完善农产品出口结构,协助欧盟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等多项策略,不断增加中国农产品对欧出口额,促进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宋晓敏)